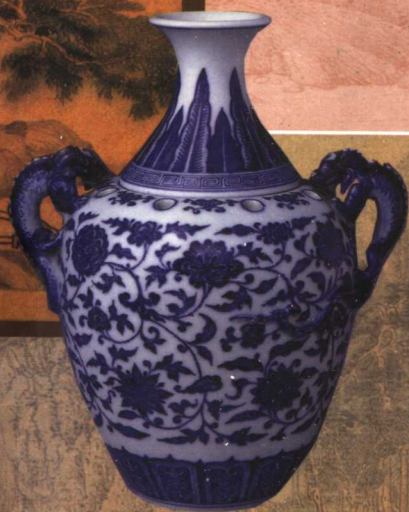


隋唐五代 文学史

毛水清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毛水清 著

隋唐五代文学史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隋唐五代文学史 / 毛水清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3.8

ISBN 7-219-04552-2

I. 隋... II. 毛... III. ①文学史-中国-隋唐时代②文学史-中国-五代十国时期 IV. I20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4060 号

责任编辑 马丕环

责任校对 农向东

隋唐五代文学史

毛水清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邮政编码: 530028)

南宁市桂春路6号)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26.125印张 737千字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南宁市源流印刷厂印刷

2003年8月第1版

2003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7-219-04552-2/I·693

定价: 46.00元

序

梁超然

毛水清教授的新著《隋唐五代文学史》的三校稿，厚厚一摞摆在我的案前，足有70万字吧！看着这摞书稿，心中萌生由衷的钦佩。因为我知道这几年毛水清教授工作特别繁忙，他在带着几名硕士研究生，上不少本科班的课，教学任务够重的；不仅如此，他还和民盟广西区委的领导班子一道，带领着广西的民盟盟员一道前进；他又是广西政协的常委，参政议政、社会工作很不少。可是，三年多的时间里，却给读书界送上了这么一部有特色、有深度的学术著作，实在不容易。我深知学术生涯之清苦与艰辛，而水清教授孜孜不倦，乐此不疲，这种执著献身学术的精神更使我感动不已。水清教授命为此书作序，我极为愿意得先睹为快的机会，愉快地答应了。本着向水清教授学习的念头，把全著浏览一过，现在把阅读的感受简略写在下面，不足为序也。

新时期以来，学术界迎来了真正的春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得到真正的贯彻。在学术的春天里，学术著作如雨后春笋，到处破土而出，远不止是汗牛充栋了。不过，说一句得罪人的话，在这个著作之林中，是良莠不齐的，并不都是真正有特色之作。拜读了水清教授新著，感到这确是一部新见迭出、有较高水平的著作，书中处处闪着创新的亮点，特色非常鲜明。隋唐五代文学的研究，研究者繁多，成果也最丰富，应该说是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显学”。在“显学”中能够创新，写出新意就更难能可贵了。

有学者把隋唐五代文学比作群星灿烂的天空，尤其

是唐代文学，这个比喻总体来说是恰当的。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历史的局限、研究水平的局限，我们对这个群星灿烂的星空的描述是很不够的，不少文学史著述，只关注了最明亮的如月亮、启明星、北斗星等若干颗巨星、大星。这自然是够全面的，星空不只是有月亮巨星和大星，无数的大大小小的星星才组成了无比灿烂的星空。当然用星空来比喻唐代文学的盛况又有它不完全恰当之处，因为星空的星星是无数的，而唐代文学则还是有数的。以诗而论，《全唐诗》收入诗人 2200 多人，作品近 5 万首。这个数，虽是有数，但无论是哪一部文学史都不可能把他们全写进去。然而，一部文学史仅仅写到一些巨星、大星，是不可能反映出文学史的全貌的；作为“史”则确实应该在一定范围内反映出这个时代的全貌来。挂一漏万固然不能反映全貌，挂十漏万、挂百漏万也是不可能反映全貌的。所以我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曾提出过唐代文学研究不要忽略一些颇有成就或颇有特色的中小作家。后来学术界对中小作家给予了更多的关注，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了。

水清教授这部新著最明显的特色之一，就在于以细致的学术眼光与饱满的热情关注一些颇有成就、颇有特色的中小作家。像中唐时期的李余、刘猛，现在的《全唐诗》仅留有李余的二首，刘猛的三首诗。但是，两位诗人在当时的诗坛上却是有影响的，他们同元稹、贾岛等诗人有来往，他们写的乐府诗元稹就有不少和诗。晚唐张为的《诗人主客图》把他们归入“高古奥逸”诗派的“入室”诗人，说明了他们在诗史上是有特色有影响的诗人，应该在文学史上写上一笔，保留历史的面貌，而不以今天留存作品的多少为立论依据。水清教授此著在“元白诗派”一节中对李余、刘猛这两位诗人作了简洁的评述，文字不多，却颇为中肯。

水清教授对中小作家的关注，在晚唐五代诗坛的论述中尤其突出。晚唐诗坛除小李杜和温庭筠等几个诗人

外，都应属于中小作家。以往学术界对晚唐作家有重视不够的倾向，所以一般只对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几个最重要的诗人给予充分研究外，其他一些诗人则涉及不多。水清教授则对一些过去文学史上研究不够充分的作家，甚至没有提及的作家，用较多篇幅进行了论述。最典型的是对五代南楚诗人的研究。五代楚国在湘南以隐居衡山的廖融为中心，聚集了一批诗人，他们多为隐士，在一起相互切磋、相互唱和，风格近似，应该是一个小诗派，可称之为湘南诗派或南楚诗派。这一诗派的诗人有廖融、王正己、王元、翁宏、陆蟾、杨徽之、任鹄、伍彬、张观等。这些诗人留下的诗作不多，但在当时作品是不少的，如翁宏，当廖融南游时有《谢翁宏以诗百篇见示》，可知翁宏当时流传的作品并不少，只是历史的原因散佚了。其他诗人也有这种情况，这些诗人在当时对诗歌的发展是起过作用的。水清教授把这些诗人写入文学史，肯定其作用，很有学术眼光。这是我十分欣赏的一点。

水清教授此著还有一个贡献，就是他在著作中以充分的篇幅论述了骈文这一文体。写隋唐五代文学史是不应该忽略骈文的。骈体文自汉末建安时期形成之后，对文学作品的艺术性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骈文有不少优秀的篇章，如著名的《滕王阁序》等，不能一概以“形式主义”、“浮华”看待，特别不能为了提高古文运动的历史地位而把骈文一概否定。水清教授此著辟专章论述唐五代的骈文，恢复唐五代骈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对骈体文的艺术追求，形式上的艺术美、韵律美以及辞藻华美的艺术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如对舒元興的《牡丹赋》的分析就十分中肯；对晚唐骈文的复兴，对李商隐骈文的成就，也论述得颇为精辟。这又是我十分欣赏的。

我特别欣赏的还有水清教授的著作语言。水清教授是资深学者，对要阐述的问题熟透在心，所以娓娓道来，

使读者如坐春风，毫无生硬隔膜之感。水清教授又是一位散文家，出版了《莲心集》等散文集子。正由于此，这部文学史著作中，不时渗透优美的散文笔调于其间，散文语言与论述水乳交融，增添了语言的美感。我一向十分钦佩闻一多先生《唐诗杂论》的语言艺术，《官体诗的自赎》等篇其实可以作为诗来读，闻先生是把诗的语言融进论文去了，可说是以诗写论文。水清教授在娓娓道来的叙述中融进了优美的散文笔调，也是一种创新，值得称道。

水清教授研究隋唐五代文学如果从1961年算起，已经整整41年了。41年在学术的道路上千辛万苦，结出了丰硕的成果。这部《隋唐五代文学史》融进了他41年的研究心得，可算是水清教授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了。但是，水清教授精力充沛，身体康健，还有很长的学术道路要继续行进。当然，正像我上面提到的，学术生涯是艰辛而清苦的，现在更是如此。花费了大量心血与辛劳，写出著作来，出版时还得自己找钱付印刷费用等等，这种情状，令人唏嘘不已。但是明知如此，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事业，为祖国先进文化添砖加瓦，水清教授还会一如既往，苦苦前行的，今后必定还会有更多的成果贡献给广大读者，我们热切地期待着。

壬午深秋于三书斋



目 录

序	梁超然	(1)
第一章	隋代文学	
第一节	南北文风的融合	(2)
第二节	卢思道	(6)
第三节	薛道衡	(10)
第四节	杨素与杨广	(14)
第五节	隋代民歌	(17)
第二章	初唐诗坛	
第一节	王绩与王梵志	(20)
第二节	贞观之诗	(25)
第三节	初唐四杰与刘希夷	(36)
第四节	文章四友	(51)
第五节	沈宋与律诗的定型	(59)
第六节	陈子昂	(65)
第三章	盛唐诗坛	
第一节	张说与张九龄	(79)
第二节	吴中四士	(90)
第三节	王孟诗派	(95)
第四节	高岑诗派	(116)
第五节	王昌龄	(146)

第四章 李白与杜甫

- 第一节 李杜的生平与思想 (163)
- 第二节 李白诗的思想艺术成就 (191)
- 第三节 杜甫诗的思想艺术成就 (210)
- 第四节 李杜诗对后世的影响 (230)

第五章 中唐诗坛

- 第一节 元结与《篋中集》 (239)
- 第二节 顾况与李益 (260)
- 第三节 大历十才子 (279)
- 第四节 韦应物、刘长卿及江南诗人 (308)
- 第五节 元白诗派 (355)
- 第六节 韩孟诗派 (399)
- 第七节 刘禹锡、柳宗元和李贺 (421)

第六章 晚唐诗坛

- 第一节 杜牧与许浑、张祜、赵嘏 (440)
- 第二节 李商隐、温庭筠与三十六体 (470)
- 第三节 唐末写实诗人 (486)
- 第四节 司空图与唐亡前的其他诗人 (510)

第七章 隋唐五代传奇

- 第一节 传奇的得名及由来 (530)
- 第二节 过渡期：隋及初盛唐传奇 (536)
- 第三节 繁荣期：中唐传奇 (552)
- 第四节 衰落期：晚唐五代传奇 (573)
- 第五节 唐代传奇的艺术特色 (603)
- 第六节 传奇繁荣的原因及其影响 (617)

第八章 唐文概说

- 第一节 唐赋的兴盛 (625)
- 第二节 骈文的变迁 (639)

第三节	古文运动	(654)
第四节	变文的出现	(677)
第九章	唐五代词	
第一节	词的起源	(687)
第二节	敦煌民间词	(689)
第三节	诗人之词	(695)
第四节	温韦与花间词	(702)
第五节	李煜、冯延巳和南唐词人	(725)
第十章	五代十国诗坛	
第一节	罗隐与吴越诗人	(741)
第二节	南唐诗人李建勋、李中和徐铉	(753)
第三节	西蜀诗人韦庄、贯休和花蕊夫人	(764)
第四节	闽国诗人韩偓、徐夔和黄滔	(782)
第五节	荆楚诗人齐己、翁宏和裴说	(799)
主要参考书目		(819)
后 记		(826)

●第一章

隋代文学

隋文帝杨坚于 581 年逼使外甥北周静帝宇文阐退位，建立了隋朝。开皇九年（589）又消灭了一衣带水的陈朝，终于统一了全国。隋朝结束了自西晋以来二百多年的南北分裂的局面，为南北文化和文学的融合创造了条件。隋朝虽然只是一个短命的王朝（580—618），但南北文风的交融成为最基本的潮流，也体现了隋代文学最基本的特色。《隋书·文学传论》说：“江右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彼累句，各去其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

隋代是南北朝文学与唐代文学的一个过渡时期，除了交融的趋向得到进一步肯定外，它的突出之点还表现在：第一，宫体诗仍然占统治地位；第二，七言歌行得到一定的发展；第三，边塞诗有一定的成绩；第四，也有一些小诗写得刚健，清新可喜。可以说：一方面南朝浮艳柔弱的诗潮还在隋代泛滥；另一方面光辉灿烂的盛唐诗歌也在隋代萌芽出新的发展趋势，隋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

隋代文学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可分前后两个发展时期。前期大致是隋文帝时代，包括开皇和仁寿年间，比较重要的文人有卢思道、李德林、柳骥（同“辩”，北齐新造字）、薛道衡、杨素、牛弘、孙万寿等，这些文人有的是北齐、北周旧臣，有的是

梁陈入隋的降官。他们在创作上容易承旧习，走老路。隋文帝对此有必要的警惕。他在开皇四年（584）曾下诏要求“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并惩办文风靡丽的官员，在改革文风中取得一定的成效，一时使风气趋于质朴。但由于他本人文化不高，又“不悦诗书”，未能全面总结前朝文学的经验教训，真正“去弊存正”，因此也就不能拨正南北文风融合的正确方向，使齐梁余风的暗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得以继续存在。后期大致是隋炀帝时代，即大业十多年间，比较重要的文人有炀帝杨广本人，还有虞绰、虞世基、许善心、王胄、虞自直、王通等。由于炀帝小时就倾慕南朝文化，当太子时还遮遮掩掩，篡弑上台之后，便重新提倡浮艳文风。但北国原存的贞刚之气也仍在潜移默化中起作用。因此，整个隋代都仍在南北文风交融的大趋势中，虽有激荡，有回波，但并没有停止。总的说来是发展的，前进的。下面我们还要专节论述。隋代国祚短促，没有出现伟大的诗人，但比较杰出的诗人还是有的，他们是卢思道、薛道衡、杨素、杨广等人，薛为隋代文学之冠。

第一节 南北文风的融合

文帝出身于鲜卑化的汉族家庭，既是北周明帝的连襟，又是宣帝的岳父，因此，他夺取帝位而建立的隋朝，自然继承了北朝的政治和文化。后来南下灭陈统一全国后，也不能不受到南朝政治和文化的深刻影响。故而当时南北文化融合的趋势是一种客观的必然。当然融合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隋代并没有完成。一般认为盛唐之诗的出现，说明融合的实现，这已经是一百多年之后的事了。

事实上，南北文化的相互渗透、交融，在隋朝建立以前早已开始了，萧梁时期的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中首唱融合南北文学之长，但文人在创作中的融合最初未必是自觉的，这也是事实。

南朝与北朝无疑是对峙的政权，互相防范。北朝军事上占优势，南朝文化比较发达。然而由于长期的战争，彼此疆域的变

迁，有的文人从南方被俘到北朝，也有的人士从北方迁徙到南朝，文风的相互影响也不可避免。如著名的北朝诗人、骈文家温子升，自称太原人，是晋大将温峤之后，当然是北人。但“世居江南”，受南朝文化的熏陶，从小“博览百家”，因而形成“清婉”的文风。他在宋文帝时避难归魏，成为北朝的“大才士”，许多军国文翰都出于他的手笔。他的诗和骈文不仅在北朝流传，而且也流传到南朝和吐谷浑等国。据唐刘餗《隋唐嘉话》记载，连庾信也称赞他的骈文《韩陵山寺碑》，说“唯韩陵一片石堪共语”。该碑确实辞藻华美，既不像南朝一些骈文爱用僻典，却又自能成一家。他的诗有些已开初唐风气，《捣衣诗》就使人想起沈佺期的《独不见》，乐府诗《白鼻騊》写得质朴，构思直接影响了李白的同题作品，难怪梁武帝萧衍称他为“曹植、陆机复生于北土”，说明他不仅“自雄北方”（明张溥），而且兼有南北文风的某些长处。庾信的例子更为人所熟知，他挟重名由梁入魏，对北朝文坛有很大的影响，《北史·文苑传》说：“聘于东魏，文章辞令，盛为邺下所称。”后来庾信老死西魏，有更多的北朝文人追随他，“貽范缙绅，悬诸日月”（北朝宇文道《庾信集序》），而自己也受北朝贞刚之气的感染，诗人从前期的轻艳柔美变为苍劲悲凉，使诗赋和骈文取得更大的成就，因之被杜甫誉为“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其一），“暮年诗赋动江关”（《咏怀古迹》其一），“实启唐之先鞭”（明杨慎《升庵诗话》）。以散文《颜氏家训》著称后世的颜之推，与温子升、庾信的经历都有些相似，他原为琅邪临沂人，先祖东晋时定居建康，以北人受南朝文化的教育，仕宦后被西魏从江陵掳至关中，先后仕西魏、北齐、北周又入隋。这样的身世，使他的《颜氏家训》对南北文化风气的不同有许多精到的见解，又可以说《颜氏家训》是融合南北思想、生活和文风而提炼总结成的一部著作，它的深刻于前人并非偶然。

南北文化的融合，从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493），大举提倡汉化以后速度加快了，北朝文学也开始繁荣起来。到了隋朝统一前，实际上总的水平已与南朝相互颉颃，相距不远。有名的诗人除了温子升，还有邢劭、魏收等人。邢劭与温子升齐名，

世称温邢。邢是取法沈约的，而魏收却模仿任昉，他们年事晚于温，已先后进入北齐了。沈约是江南的世族，永明体的倡导者，声律论的创始人。任昉也是南朝齐梁的著名文人，年事也晚于沈约，但时称“任笔沈诗”，也是齐名的。北周入隋的诗人卢思道则是邢劭的弟子，可见也是学习南朝文化而成长起来的。这样，南北文风的差异，越往后，到了隋唐之际也就渐渐缩小了。

南北文风的差异，客观上是由于南北朝长期的分裂，有不同的政治经济状况，不同的自然和地理环境，不同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同时，也由于所处的不同的社会地位和个人气质。南方士族无论是江南世族，或是中原南渡的高门大第，都是朝廷的依靠力量，得到优厚的待遇，生活阔绰，有充分的闲暇从事传统文化的学习，游山玩水和文学创作，而北方则在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之下，汉族士人受着种种猜忌和苛待，弄不好还会被杀，他们的地位是低下的，即使少数士人任官，也是战战兢兢，无法尽其心智和才能。他们学习和创作的条件就差多了。因此，南朝的诗歌创作总量大大超过北朝，而不涉及政治的实用性散文《水经注》《齐民要术》等则多出于北方作者之手，这都是与他们平时进行实际调查和农业生产实践分不开的。在学风方面，南方重玄，北方重儒；南方偏重务虚，北方比较务实；南方奢华，北方节俭；南方喜清谈，故哲学论文多，北方关注政治盛衰，故史论多。在文学创作方面，南方多闲适写景和儿女之情，北方多骑射战争，即使是情诗，也以直率大胆见长，缺乏南方的那种温柔缠绵。《敕勒歌》和《木兰诗》不能出现于南朝，《吴歌》《西曲》也不能产生于北国，这是南北长期形成的习尚差异和作者个人气质不同的反映。^①

隋朝建立后，朝廷有意以北周文化为主，酌用南朝文化。所谓北朝文化，实际上是鲜卑族文化和汉族文化的混合形态。对文学，尤其是诗赋是比较轻视的。以音乐论，隋初是沿袭北周旧曲，“今太常雅乐，并入胡声”^②。胡声包括“鲜卑之音”和高昌、龟兹乐等，后来才参用梁陈雅乐。梁陈雅乐，文帝最初以“亡国之音”目之，强烈反对，后来亲聆演奏，说“滔滔和雅，甚与我心会”，终于高兴地同意了。文帝本来既不知乐，也不知诗，对

于诗赋也持反对态度，把创作也看成亡国之音。为了与他“躬节俭，平徭赋”的政策相呼应，他也继承北周文帝的主张，企图改革“浮华”的文风，泗州刺史司马幼之因为“文表华艳”被治罪，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隋文帝的亲信，由北齐北周入隋为官的李涿奉旨写了《论文书》，猛烈抨击江左齐梁文风，人所熟知的名句是：“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还有“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朴，用辞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为政日乱……”等句，可以说义正辞严，声色俱厉。应该说此文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和积极意义，“正俗调风”的动机是好的。但他全盘否定南朝文学，否定诗赋的全部创作，第一，甚至把“魏之三祖”（曹操、曹丕、曹植）也作为批判的对象，连风骨嶙峋的建安文学也否定了；第二，“贵贱贤愚，唯务吟咏”，虽用的是夸张失实的语言，批评南朝社会对诗赋创作的重视，恰恰说明当时创作风气之盛，揭示了当时文学繁荣的原因；第三，这篇“上书”本身也是骈文，文风也是“华艳”的，文字上也争奇斗巧，正好与其主张相矛盾，可见“屏黜轻浮，遏止华伪”，“弃绝华艳”，主要应该从思想内容上着眼，不能也不应该盲目排斥文学形式和语言技巧。由于这篇文章观点的过激和片面性，因而对于扭转隋初文坛的不良文风虽不能说毫无作用，但客观效果并不理想。

隋代研究声韵的书，可提及的有刘善经的《四声指归》和陆法言的《切韵》。刘善经，河间人，《隋书》本传说“博学洽闻，尤善词笔”，可见也是文学家。在隋代当著作佐郎和太子舍人的官。他的《四声指归》一卷大约中唐时仍存于世，日人遍照金刚的《文镜秘府论》收的《论体》和《定位》两篇文论，今人以为即是该书的一部分。如果其说不谬，这就说明该书总论创作，不仅仅是声韵，视野是比较宽的。如论体，即分列博雅、清典、绮艳、宏壮、要约、切至六体，加以申论，又谈构思定位，“凡作文之道，构思为先”，“凡制于文，先布其位”。他认为“大略而论，则思下辞而可承；陈其末，则寻上义不相犯，举其中，则先后须相依附，此其大指也”，要求“理贵于圆备，言资于顺序”，

“一篇之内，文义得成；一章之间，事理可结”。对于音律，希望推校安稳，反对“理无配偶，音相犯忤”。大抵是根据曹丕《典论·论文》和陆机的《文赋》的一些主张，结合自己的创作体会而写成，比较具体切实，应是修辞指南之类的辅导书。《文镜秘府论》指出：“沈侯（沈约）、刘善（刘善经）之后，王（王昌龄）皎（皎然）崔（崔融）元（元兢）之前，盛谈四声，争吐病犯，黄卷溢筐，绀帙满车。”这就告诉我们刘善经的《四声指归》，上承南朝齐梁周颙、沈约的声病说，下继初盛唐相传流行的崔融《新唐诗格》、元兢的《诗髓脑》、王昌龄的《诗格》等著作，说明隋朝社会上探讨诗词创作技巧的风气一直是盛行不衰的。这对于唐代近体诗的形成，既从语言声律方面，又从其他的创作技巧方面长期作了准备，它的积极推动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考虑到刘善经的《四声指归》是在隋文帝严厉鄙薄诗赋创作，甚至严厉处置“文表华艳”的官员的情况下写成的，这种勇气和胆识更加可贵。陆法言的《切韵》（五卷）也是这种文人私下热衷于研究诗词创作，尤其是声韵技巧的产物。该书是由颜子推、卢思道、薛道衡、刘臻、魏渊、李若、萧该、辛德源八人，在陆法言家里共同讨论，后由陆法言执笔写成的一部集大成的韵书，始于开皇初年（581—583），成于仁寿元年（601）。这部韵书是以当时的共同语音为基础，吸收其他重要方言的某些音类，参合六朝以来各家韵书的反切，编纂而成的。由于体例和音类博采众长，审音准确高超，音系“酌古沿今”，所以该书取得了巨大的收获，成为一时规范诗人创作的准则，对后世的韵书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对刘善经《四声指归》的有益补充和具体化。该书的参与者都是隋代有重要地位和相当影响的诗人和文学家，既有南人（如刘臻），也有北人（如辛德源），语音包含了南北的一些地方方言，因此把它说成隋代南北文化交融的一个重要成果也是恰当的。

第二节 卢思道

卢思道，字子行，范阳涿人（今河北涿县）。16岁时师事当

时著名文人邢劼，又向另一著名文人魏收借“异书”，发奋苦读。“数年之间，才学兼著”。为人狂放不羁。历仕北齐、北周，多次被贬。杨坚当丞相，他出任武都太守，作《孤鸿赋》，自叙：“势利货殖，淡然不营，虽笼绊朝市且三十载，而独往之心未始去怀抱也。”抒发“清高之气”，郁郁不得志。后随高颀伐陈，作《为隋檄陈文》，当时颇有影响。他的诗最出名的是《从军行》，继承体现了南北文风融合的清刚之气：

朔方烽火照甘泉，长安飞将出祁连。犀渠玉剑良家子，白马金羁侠少年。平明偃月屯右地，薄暮鱼丽逐左贤。谷中石虎经衔箭，山上金人曾祭天。天涯一去无穷已，蓟门迢递三千里。朝见马岭黄沙合，夕望龙城阵云起。庭中奇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白雪初下天山外，浮云直下五原间。关山万里不可越，谁能坐对芳菲月？流水本自断人肠，坚冰旧来伤马骨。边庭节物与华异，冬霰秋霜春不歇。长风萧萧渡水来，归雁连连映天没。从军行，军行万里出龙庭。单于渭桥今已拜，将军何处觅功名？

这首诗以边塞为题材，写出了征人思妇互相思念的痛苦，并对追求功名的将军作了委婉的讽刺。句法多用对偶，语言清丽流畅，是一首早期优秀的七言歌行。安史之乱后，唐玄宗从蜀回京，登兴庆宫的勤政务本楼，曾歌其中“庭中奇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两句，可见其对唐人的影响。诗中对塞北苦寒之状的描写相当真切，与他在北国的亲身经历有关，这是大大超出了南朝作品的地方。

《从军行》是一首乐府诗。卢思道原有文集 30 卷，今存《卢思道集》乐府诗仅 11 首，内容多为思妇、游宴和求仙。比较好的如《日出东南隅行》：

初月正如钩，悬光入绮楼。
中有可怜妾，如恨亦如羞。
深情出艳语，密意满横眸。